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有同志指出，1977年官方版《毛泽东选集》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夏尔·贝特兰在《大跃退》中进行了举证：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篡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式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的话。...

.....

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分散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故在此贴出1968年武汉办《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收录的，当时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纪录稿供同志们对照阅读。——编者按)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在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谈，其中有些新东西。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不够的地方。谈一谈，考虑这些问题，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弯路。我先把十个问题念一念：

(为方便同志们阅读，毛泽东同志念的这十个问题可以点击跳转至相应内容)

第一个问题，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第五个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六个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七个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

第八个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第九个问题，是非关系；

第十个问题，中国和外国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现在我来讲上面提的十个矛盾。

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于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让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加重一些，是不是要改重点？重点没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这方面要加重一些。

加重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哪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能积累得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真想假想，在我们这里来说，不适当。谁不真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资，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于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不照顾人民生活，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作法，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几十年后算总账，那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结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注意照顾沿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的、大的错误。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谓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的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讲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比如鞍钢、抚顺就在沿海；比如大连有造船工业；唐山有钢铁工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钢铁工业，有机械工业；上海有机器工业，有造船工业；南京有化学工业，还有其他许多其他工业；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义。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

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们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的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努力搞好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从现有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样，五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说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们的远景规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鲁迅，大学没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是没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总之，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维持，而是要适当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都裁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们，我们还受敌人包围么！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军队更强大。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次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想要爱国，爱不那么快，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我们过去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我们已经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摆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军政费用支出的比重，分几个步骤，降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飞机，很多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你真想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你假想要原子弹吗？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究竟怎样才好，请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战略方针问题。

在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关，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

的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低下来，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最近，我们跟各省的同志谈，他们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多。

讲工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

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过去家里根本没有职业的，现在有人就业了。有些只有一个人就业的，现在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业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家庭，过去他们没有就业的，后来夫妇两人还有一个女儿都有了职业，合起来生活当然就不错了。我们的工资，一般的说，还不算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又因为物价低而稳，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根本不可比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直是高的。

上面讲的，是要注意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厂，整个生产单位也有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统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统一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差别性。比如，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当然不要。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起来，把工厂的折旧费也都统统拿走，使得生产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不多，在座的同志们的经验恐怕也不多，我们正在研究。那么多工厂，将来还要多，使得它们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对我国的工业化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讲到农民。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也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全国因水灾减产，我们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农民就有意见了。不能认为我们一点缺点也没有。没有经验，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由于我们发现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减，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对我们有意见的农民都没有意见了，都说：“共产党真是好”。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经济组织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须搞好，必须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经济就不会办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错误。在那里，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办得并不是那么好的。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须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们跟各省的同志们谈了夏收、秋收的分配问题。所谓分配问题就是：①国家拿多少；②集体拿多少；③农民得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问题。国家是税，集体经济组织是积累和经营管理费，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钱。

集体经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了。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

金是为了再扩大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项，我们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确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

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稳当的。得到少数民族的赞成。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有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按人口，汉人占大多数，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汉族中间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来一次检查。早两年有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在来一次检查。如果有关系不正常的，应当加以调正，不要只口里讲。现在有许多人讲不要大汉族主义，口里讲得好，实际上没有做。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究竟怎么样才适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宝藏不少，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汉民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这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这一条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因

为说到这里，应当把这个关系说一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有几个党好？现在看来，还是有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

党派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是历史上产生的，因此它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是这个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

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不要机构庞大，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又说回来了。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对这些人，我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把他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在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外交政策“一边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也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要爱国，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有利。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志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省委书记要抽出一定时间检查一下，部署一下，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呢？它是消极因素，它是破坏因素，它不是积极因素，它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那么，消极因素可不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不可以转变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不可以转变？这要看什么社会条件。死顽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就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将来有一天是会转变的，当然，有些人或许没有来得及转变，阎王就请去了，有些人谁晓得他们那一年会转变？

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由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变成不反革命了，他们参加了农业的劳动，参加了工业的劳动，有一些人还很积极，做了有益的工作。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比如讲，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不是应该的？似乎有这么一种意见：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要。这么看是不对的。应该承认，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

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让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就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各种不同的处理，是应当的。这些办法，都需要给老百姓讲清楚。

杀了的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重的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对他们讲宽大，老百姓不赞成。肯定过去杀这批人杀的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不肯定这一点就不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肯定的，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为减少。我们的社会秩序很不错，也还不能放松警惕。说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高枕无忧，那就不对。有少数

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交给农业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镇反工作，我们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

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允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阿 Q 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的愈厉害，结果闹得愈被动。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实阿 Q 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们胃口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先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经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错误，不准他改正错误，也是不好的。

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有人说对犯了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们做些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做法。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犯不改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翘尾巴。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按照情况，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

第十，中国和外国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领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说就没有缺点，没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

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过去我们这里有些人闹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一个跟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绝对主义，往往当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这样，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现在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还是有一些教条主义，应当继续做批判工作。

我们是这样提问题的，学习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认真地学习外国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几国文字。

我认为，我们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

第一，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翘不起尾巴，骄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我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来。要像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文艺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落后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八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当然我们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来说，革命先胜利一步，也要防止骄傲。

前面这两点，是缺点，也是好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穷得很，又是知识不多。一为“穷”，一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穷则思变，才要革命，才要发奋图强。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的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经有一批不错的科学家，不是说都没有知识。

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即使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们也还是要把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间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

主义阵营，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
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纪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中央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